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论纲

盛邦和

亚洲文明属于与欧洲文明不同的文明，具体又分成原型亚洲文明与新亚洲文明(太平洋亚洲文明),原型亚洲文明经现代化而成新亚洲文明。本文以东亚为主要分析对象，从比较文化学的视角开展原型亚洲文明与新亚洲文明比较，论证“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特质，叙述新亚洲文明特征及其前途命运。①

上篇　原型亚洲文明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将人类生产方式分为“古典的”“希腊·罗马的”“亚细亚的”等几种,简言之,即“欧洲”类型和“亚洲”类型两种。② 是乃人类基本的对立与互动的生命体系。人类的生命活动(生产活动是人类主要的生命活动）总要受到环境的强迫、制约与影响。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创造与环境相适的特定的生命体系与生产方式的历史。文明本质而言，即人类的生

①本文所说的亚洲主要指东亚。

②马克思说：“在大体的轮廓上,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及近代有产者的生产方式是可以表识为经济的社会结构之进展的各个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群益出版社，1950年版,第 4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命体系与生产方式

一、文明与环境

(一)文明的定义和内容

文明可视为人类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构造及文化特点的总和。文明具有“总体系”的性格;“总体系”之下,又可分为如下四个“分体系”。

A 环境体系。大陆、海洋、温暖、寒冷是环境体系的四大基本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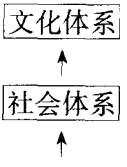
B 生产体系。人类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和环境产生两种基本对应关系,即“人一土地”的对应关系和“人一海洋”的对应关系。如是基本对应关系,形成两种不同的生产体系,即亚洲大陆型农业式生产体系和欧洲海洋型工商式生产体系,由此人类不同的文明体系也就此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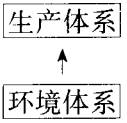
C 社会体系。人口、土地、市场、家庭、集团、政权、制度等是人类社会体系的基本要素。

D 文化体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伦理等是文化体系的基本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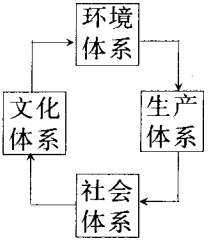
(二)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因果性、顺序性及循环性

文明形成具有因果性、顺序性及循环性的特点。一切文明形成的物质基础均为“环境”;从不同环境体系产生不同的生产体系;从不同生产体系产生不同的社会体系;最后从不同社会体系产生不同的文化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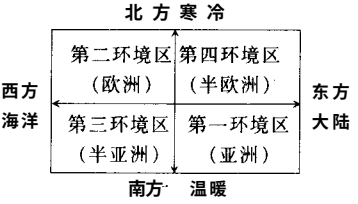




以上四个文明体系中，各下层体系必定是对应的上层体系的形成原因，各上层体系又是各下层体系作用的结果生成。文明四体系从运动方式来说,不仅有因果性、顺序性,还有循环性，下面的图形反映了这一循环的基本物象。



文明以循环的方式发展，这就决定世界各大文明都具有持久性。世界文明性质的差异与分野乃被文明运动方式的循环性与持久性决定，只要这样的循环性不被打破，文明的性质大体不变。在文明体系构造中，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描绘出世界环境分区的坐标，世界文明的坐标也就能够确定。环境坐标与文明坐标，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关系。



上表既是世界环境的坐标，也是世界文明的坐标。

山上表可见，决定人类文明的环境要素有四个。其一为大陆,其二为海洋,其 为温暖，其四为寒冷。地球据其四要素分为四个环境区。

第一环境区 温暖的大陆区(如中国、印度、中东)。

第二环境区 寒冷的海洋区(如西欧)。

第三环境区 温暖的海洋区(如日本)。

第四环境区 寒冷的大陆区(如俄罗斯、东欧)。

(三)亚洲文明区与欧洲文明区

①第一环境区(中国等)和第二环境区(西欧等)是世界最主要的环境区，它们是世界文明的主要诞生地。

② 第一区由“大陆”和“温暖”两个环境要素，创造亚洲文明。第二区由“海洋”和“寒冷”两个环境要素，形成欧洲文明

(四)混合区 半欧洲文明区与半亚洲文明区

①寒冷大陆区（俄罗斯及东欧）一方面具有欧洲文明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具有亚洲文明的性质,可以说是‘半欧洲’。

②温暖海洋区(以日本为典型),自古受海洋环境的刺激,工商业有所发展;‘半亚洲’的特点很鲜明。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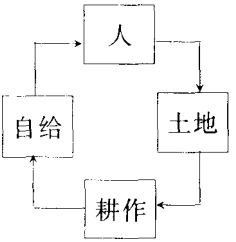
二、原型亚洲文明图解

文明体系的形成乃被人与环境的对应关系决定，对应关系的不同，形成人类文明体系的差异。在此，试分析亚洲大陆文明体系的特征(以中国为例)。亚洲大陆区,即典型的大陆区,人和

①参考拙著《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第一章，学林出版社 1988 年版。在此书中作者将世界划分为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两种文化。

环境的基本“对应关系”是“人—土地”之间的关系。这一对应关系从“人”出发:“人”依赖土地,通过利用土地与享用农产品维持生计其关系特点是:人——土地——耕种——自给——人。

图形表明如下:



三、“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

(一)“人—土地自然法则”

亚洲社会中人一旦与土地结上关系,即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法则。我们将此法则称为“人—土地自然法则”。这个法则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人口的无节制增加”与“土地的无节制倾泻”。

第一、人口“无节制增加”。农业劳动的集约性、季节性与单纯性,刺激了对劳动人口的“无节制需求”。农业人口的增加绝无计划性,以“不可逆”的方式进展。

第二、土地的“无节制倾泻”。相对于人口的无节制增加,土地面积在绝对意义上,总保持不变的常量,土地的肥力也在不断减退中。然而土地从来不会长期均等地配置在农民手中,总以“水往低处流”的形式快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即所谓“土地兼并”。我们称之为“土地的无节制倾泻”。

“人口的无节制增加”与“土地的无节制倾泻”的并存、矛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与冲突,是“人—土地自然法则的”的基本含义。如此法则的存在，构成亚洲文明体系的基本物质原因。

（二）“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

“人—土地自然法则”的存在,使“亚洲文明体系圈”得以形成。这个体系圈以如下的顺序作循环往复的运动：

第一,“人口无节制增加”,人口激增,土地不增,土地肥力衰减,由此造成社会“人口超负荷”,导致流民剧增。

第二,“土地无节制倾泻”将更多的人口赶离土地,流民问题更趋严重。

第三、土地分配的均等性被打破，社会不均的现象日趋严重。流民产生。

第四,流民组合,成为威胁既成秩序的“脱秩序势力”与“暴力源”。中国历代多流民暴动，就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脱秩序势力”与“暴力源”。

第五,“流民群”与“脱秩序势力”增大,终于形成重大社会问题，流民暴动开始。

第六、流民暴动与近代市民革命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前者并非新生产力的产物，而是古老农业生产关系的特殊接续与修复方法。

第七、流民暴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其一，超负荷人口因战争而部分消除。其二,作为“土地倾泻”主体的豪农受到冲击,流民企求的“土地均分”在战争中被强制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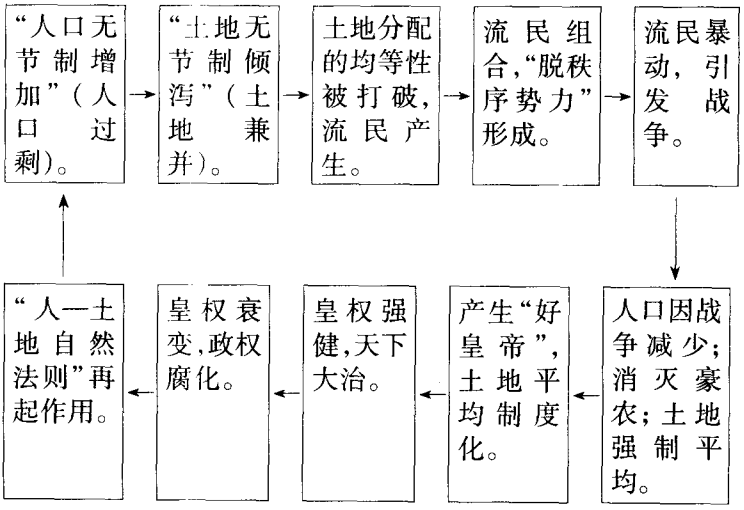
第八、作为流民暴动产生的广义社会结果，产生“好皇帝”，依靠新政府强权之手，推行均田制度，达成土地均分的制

度化。[①] 人与土地的矛盾缓和，社会由乱而治。

第九、封建威权强健，出现“贞观之治”式的治理局面。

第十、威权衰变，政权腐败；“人一土地自然法则”再起作用，新一轮“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再行启动，社会再次动乱。

将以上“体系圈”作成图形如下：



① 唐朝的繁荣与其公元 624 年实行均田租庸调法有关。基本内容是规定国家分给农民以永业田与口分田田地可以买卖，但买田不可超过一定数额农民按丁口向政府交纳租庸调日本在 624年也颁布《大化改新之诏》，将全国上地、人民收为“公地、公民”，规定农民可按人口分得“国分田”，死后由政府收回，土地归国家所有，不得买卖，是所谓班田制。两国土地制度稍有出入，但目的都是依靠政府力量施行土地平均制度化，以使农民回到土地，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参考旧本）齐藤博：《日本经济史》，法学书院 1981 年版，第 27 页。

四、“亚洲文明体系圈”决定的“原型亚洲文明”特征

中国、印度、埃及、伊拉克、伊朗等亚洲农业国家(第一环境区),都存在“亚洲文明体系圈”现象,其中中国“亚洲文明体系圈”尤其典型,由“亚洲文明体系圈”决定的“原型亚洲文明”特征也特别明显,表现如下:

(一)“平均—专制”的自然连锁

何以产生专制主义?这一问题长期来讨论很多。比如“水利说”认为亚洲大陆地区为利用河流灌溉,必须有一个专制政府。英国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则持“大陆中枢说”,称俄罗斯大部分国土在亚洲腹心地区,为防止周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入侵,创立军事集权与专制政权。① 其实,关于中国专制主义发生的原因,有其独有的特点:“亚洲原型文明体系圈”及其作为主要特点的“平均—专制”的怪异连锁的存在是中国式大陆专制主义成立的最主要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社会动乱的初因是流民剧增与农民(流民)暴动。流民(失去土地的农民)是社会的动荡震源与暴力引媒,而究其起源,则在于农业社会的最大分配不公即土地不均。而使土地分配恢复平均的方式只有两个:流民暴动与皇权专制。土地不会自动回到农民手中,除农民暴力之外,皇权对土地分配的强制干预实为妙法。中国人口众多,土地缺少,当众多的“饥儿”围绕着一块有限的“蛋糕”(土地),争夺与暴力在所难免。“强壮的儿童”与“弱小的儿童”在“蛋糕争夺”中,后者总处于弱势,由此阶级产生,不平滋长,动乱

① 麦金德:《历史的中枢》,中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4页。英国H.J.麦金德曾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演讲,1919年又著《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提出著名的“陆心说”理论。

益烈。这样,社会就必然呼唤一个“超然的强者”与“看得见的第三只手”,用超乎强者与弱者之外的超社会力量,安排“儿童”的秩序,决定“蛋糕”(土地)的均分。这第三种力量,无异就是皇权的力量。诚如福泽谕吉所说:“一国实行专制政治不一定是砖制君主和官员的过错,实际上国民……自己招致了这一不幸的政治。”专制主义实际上和农民有很大关系,可悲的农民祈望“土地的绝对平均”,结果总欢呼王权的复活与皇帝的再生。①专制主义由此在农民的吁求中真理化、权威化与渗透化。皇帝崇拜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强势思维态势。②“平均”必然抹杀“平等”:“平均”与“平等”不可共存。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合理社会中,“平等”是“机会均等”与人格平等,而在中国“经济平均”的社会,一切生活资料(如土地)都由皇帝授予,农民绝难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机会均等”,被视为“小民”,而失去“人格平等”。中世纪人民以承受经济、政治与文化专制的巨大代价,换取土地的平均、社会的安定与起码的生计。以“平等”换“平均”,为平均促专制,“平均”和“专制”成了“孪生子”:“平均—专制”的自然连锁由此而生。

(二)“停滞—石女”的终极效应

尽管中国每次农民起义都开创新国家和新政府,但总体而

①福泽谕吉:《劝学篇》,现代教养文库 1988 年版,第 32 页。

② 中国自秦汉以来乃为君主专制社会,但钱穆却“仍将不惮反覆对此问题做辩护”,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并无所谓专制,唯蒙元、满清两个政权可作专制论。其实专制在一个意义上是经济学的问题,也即依靠政府威权的“专有裁制”达到社会土地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封建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乃建立在土地分配的均衡之上。由此可看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必有性与必要性。钱穆论中国无专制,参见《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4 页。

言仅对旧“旧亚洲圈”作调整与恢复，是乃中国历史的悲剧。中国历代王朝总把‘平均’视为基本国策，长期实行‘平均策’，寿命必长，不实行‘平均策’，则其必然成为‘短命’王朝。汉唐盛世何以成其‘盛世’？秦隋何以‘二世而亡’？一个原因就在前者持久有效地实行‘均田’，而秦隋‘均田’不力。

历朝施行‘平均政策’，也产生恶果：中国人的创造性、竞争性和追求财富的欲望由此抑制，工商不起，市场委顿。① 如果要问现代化为什么最早发生于西方而不是亚洲的中国，原因要从这其中去寻找。为什么旧亚洲社会是“停滞社会”？为什么旧亚洲文明是“停滞文明”？一个重要原因是旧亚洲文明内部总是产生不了‘市民’。为实行‘平均主义’，必须抑制强商。强商总用金钱购买田地，结果加剧土地兼并，社会均衡局面被打破，最终发生社会动乱，因而中国皇帝总实施“抑商政策”。社会发展和“人类”成长有着固有规律：“自然人→农民→市民”，是‘人类’成长的图解；丛林社会（自然社会）→土地社会（农业社会）→市场社会（工业社会）是社会演进的方程，与此对应，在社会的权利特征上则出现自然权→集权→民权的顺序变化。如果市民阶层成长与强大，则会通过市民变革建立市民社会。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典型亚洲社会在历史上‘重农抑商’，乃为无法诞生市民、市民社会与社会生产效率的“石女”，东西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

①日本秋泽修二有《中国社会构成》一书，表示国际学术领域对中国（亚洲）停滞论的关注，但此书的亚洲扩张论应予以批判。

下篇　太平洋亚洲文明的产生与其特征

上世纪 70年代以来,太平洋亚洲地区出现“经济奇迹”,尽管此后爆发东亚经济风暴，但这个地区的“文明”已经攀升到一个崭新与重要的平台，走出愚昧落后的境遇，进入世界现代化的行列,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原型亚洲文明”已向新的“太平洋亚洲文明”转化,一个“新亚洲文明”正在出现。开展这个文明的研究,将其与原型亚洲文明论衡比较，探询这个文明的成因与特质，是一项有益的工作。

一、亚洲现代化的波动与模式

(一)亚洲现代化的第一波与第二波

以 1945年划界，将亚洲现代化划分为第一波现代化与第二波现代化。1945 年前的日本为亚洲第一波现代化国家，而 1945年后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则为亚洲第二波现代化国家或地区。

(二)亚洲现代化的四个发展模式

亚洲基本的经济模式是两个，亚洲的政治模式也是两个。纷繁多彩的各类模式都是这四个模式的魔方翻花。

经济模式：

其一、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其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政治模式：

其一、议宪政治模式。

其二、集权政治模式。

议宪模式也称自由民主模式与议宪模式。集权模式表现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家主义模式、民族主义模式[1]或独裁模式。这样世界上就出现了以下四种基本现代化模式：

其一、自由经济与议宪政治结合的模式（民主自由主义）。

其二、自由经济与集权政治结合的模式（国家自由主义、威权资本主义）。

其三、社会经济(非市场经济)与集权政治的结合(“原典”社会主义)。

其四、社会经济(非市场经济)与议宪政治的结合(在经济上主张社会原则，在政治上首肯议宪政治，即社会民主主义）。

（三）亚洲第一及第二波现代化模式图解（以日本与韩国为例）

1. 第一波(1868—1945)，以日本为例。

明治维新与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自由经济——→藩阀威权政治——→自山民权运动——→自由知识分子的转向——→国粹主义——→国家主义——→亚洲主义与战争主义——→战争失败，日本及亚洲第一波现代化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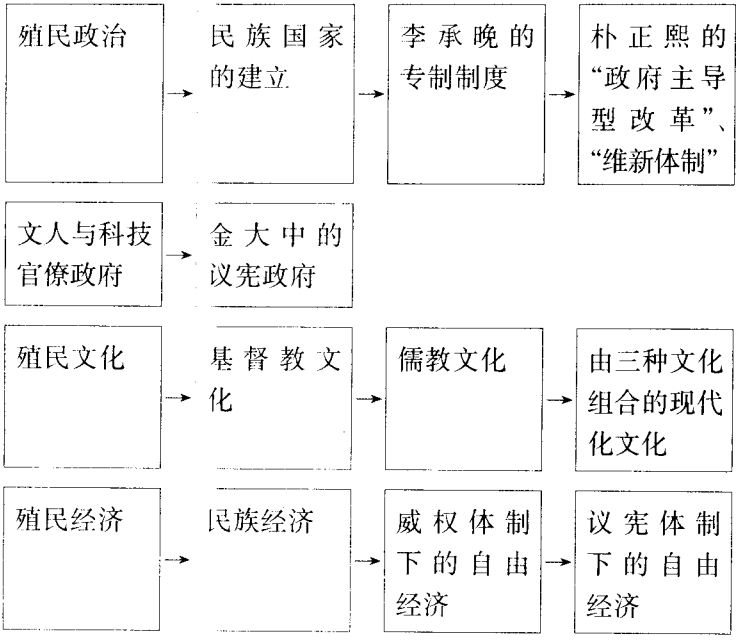
2 第二波(1945一今天)，以韩国为例。

殖民主义政治与经济——→民族国家的建立——→自由经济——→威权政治：李承晚的专制制度——→朴正熙的“政府主导型改革”“维新体制”——→自由经济——→威权体制下的经济成功——→市民社会成熟——→民主要求提出——→文人政府——→议宪政府——→民主制度的建立。

社会的发展总与文化发生互动的关系，因此在研究韩国现代化过程中有必要对韩国殖民文化、基督教文化与传统儒教文

①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原是一个单词：nationalism

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表示关切。以下是韩国现代化道路的图解：



（四）亚洲第一波现代化——日本前期现代化的启示（1868—1945）

1．**日本现代化的前期与后期**

日本现代化可以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时段，其间以 1945 年战败划界。

2．**日本前期现代化最初成功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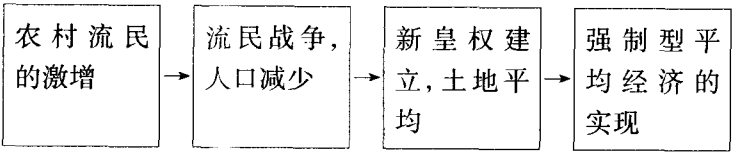
成功的原因在于经历明治维新，勇于向西方学习，引进了西方自由经济制度，促使本国比较早地摆脱“原型亚洲文明体系”，

在亚洲率先进入世界现代化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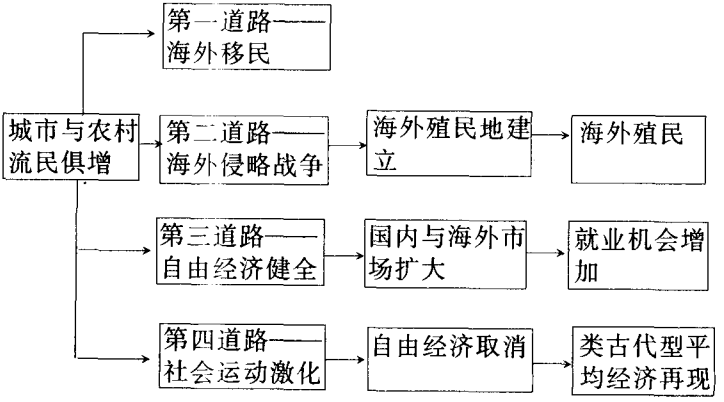
3. 日本前期现代化失败的教训

日本前期现代化期间遇到难以克服的瓶颈问题，即城市流民、农村流民与经济衰退，为了解决日益激烈的国内矛盾，产生法西斯主义，继而踏上侵略道路。如同农业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流民问题（农村流民）一样，工业现代化过程中不仅产生传统的农村流民，还产生城市流民。如同农村流民给古代社会造成震荡，城市流民也给现代社会造成震荡。因此，要将现代化进行下去，就要采取措施，消解城市流民。消解的方法是多样的，下图为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的流民消解法：

之一、古代农村流民消解方法：



之二、现代城市与农村流民消解方法：



假如向现代化前进的日本选择的是第一、第三与第四条道路，日本的现代史将会改写。然而它选择的是第二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与第三条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却因 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总爆发而被堵塞。同时，作为一心要“富国强兵”的日本也坚决用政府暴力抹杀了第四条道路即日本的‘社会主义’道路。

4. 日本前期现代化失败的思想界原因

以下对日本明治维新至二战时期思想状态作一分析。

(1)社会主义的发生与挫败

1897年日本出现最初的工会——“劳动组合期成会”。同年又有高野房太郎结成‘职工义友会’,片山潜等人参加,积极推动日本早期劳工运动。

1899年,《每日新闻》记者出身的横山源之助到社会下层做了充分的调查,出版《日本之下层社会》,描写了产业革命之后日本劳动者悲惨的境遇。

1903年在日本结成平民社，幸德秋水、堺利彦、片山潜、木下尚江等人参加,创办机关报《平民新闻》,开展社会运动与非战运动。1905 年受政府弹压而解散。

1906年诞生代表劳动者利益的政党——日本社会党。在片山潜、堺利彦的领导下拥有近 200名党员,但只维持了一年就被政府解散。①

1908年日本又发生‘赤旗事件’,在山口义三出狱的欢迎会上,打出‘无政府共产’的红旗,大杉荣、堺利彦等人被捕。

1910 年，长野县的无政府主义者宫下太吉等人计划制造炸

① 1945 年，同名的政党重新设立

弹谋杀天皇。事败之后，政府以“大逆罪”起诉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24人被判处死刑（此后有12名减为无期徒刑），至此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镇压愈益残酷。①

日本工人运动产生自己的思想领袖，著名的有幸德秋水。他曾积极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于1898年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1901年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当日就被政府解散）。著有《廿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对日本乃至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发生很大的影响。幸德秋水因“大逆事件”被害，标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

（2）自由主义的软弱与衰退

日本现代化运动曾经出现过三次自由主义思潮。明治维新后不久爆发自由民权运动，这是日本现代第一波自由主义思潮，其思想领袖是福泽谕吉等人，② 行动领袖为板垣退助等。

1873年（明治6年），在从美国回国的森有礼的发起下，成立明六社，主张自由启蒙思想，参加者有福泽谕吉、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等人，至1879年解散。1874年，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等结成日本最早的政党，即爱国公党。主张政府放弃藩阀专制的制度，给予包括商人在内的国民以更多的参政权，同时提出开设国会的要求。以此，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揭幕　1881年日本自由党建立，板垣退助为党魁。1887年，日本出现反政府的‘大同团结运动”，主张民权派

① 早在1900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治安警察法》，规定了镇压劳动运动的法规。

② 具体地说，自由权思想于19世纪末叶的日本可分为三派：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英美派；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法国派；以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德国派。

在同一目标下求大同存小异，共同对政府施压。这次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日本第一次启蒙运动的终止。

此后不久，至大正时代（1912—1926）日本又出现“大正民本主义”运动，将自山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此为日本第二次自由启蒙运动，其思想领袖为吉野作造等人。[①]此后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国家主义的张狂及政府方面思想集权的加强，使这次运动陷于失败

日本战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再次出现自由主义思潮，这可视为日本第三次启蒙运动。

回顾日本启蒙史，有必要总结日本自由主义的特点。渐进性与妥协性是日本自由主义的主要特色。正因为此，日本的自由主义所打出的旗帜不是“民主”而是“民权”写“民本”，并容忍政府的“开明专制”，主张以渐进的方式改革政治。

譬如福泽谕吉写有《文明论概略》，这是日本现代化运动中重要的启蒙主义读物。然而就是这样的一部书，对于明治维新起步伊始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对于激进的开设民选议会呼声，却没有给予过高的评价。福泽尝言，世界正在进人文明时代，文明有其外形也有其内在精神。作为西方文明“外形”的宪政制度实施于日本，须有两个基本条件做前提：其一是精神条件；其二物质条件。两个条件还没有实现，宪政制度过早推行，非谓日本之福。看来，作为日本现代化精神领袖的福泽谕吉，基本态度是以渐进的方式实现日本的政治改革。作为市民理论的倡导者，福泽谕吉当然希望尽快出现民主政治与自由的经济配对，问题

①吉野作造（1878—1933），东京大学教授，大正初年积极宣传民本主义，提出政治、外交与社会的民主化要求，在知识层中具有重要影响。（参见《广辞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